
中日甲午战争与东亚

张振鹍

一、一场东亚地区性战争

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之间的一场战争。但是谈到这场战争决不能仅谈中国和日本,还必须谈到朝鲜。当然往往也要谈到其他国家,例如,要谈英美,要谈俄德法,等等。不过,朝鲜与其他国家在甲午战争中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谈欧美各国,是要说它们对战争的调停、干预等等,都属于战争外部的活动,这些国家都是置身于战争之外的。而朝鲜则身处于战争之中:这场战争是因朝鲜而起的,是在朝鲜爆发的,然后又有一些激烈的战斗是在朝鲜土地上进行的,结束战争的条约第一款就是关于朝鲜,如此等等,总而言之,甲午战争从其发生、进程及结局等各方面看,都直接牵连到朝鲜,朝鲜在多方面成为这场战争的直接关系者。这就是说,东亚三国中国、日本、朝鲜尽管地位、处境各有不同,但都卷入了这场战争的漩涡或干系之中,战争超出中日两国的范围,涵盖了东亚地区各国,这事实上是一场东亚地区性战争。

把中日甲午战争如实地看作一场东亚地区性战争具有重要意义,这将有助于说明这次战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何以这场战争发生于朝鲜?何以在朝鲜爆发的是中日战争?它何以又扩大到了中国领土并终结于中国?日本取得战争胜利在东亚国际关系中

有什么含义？中国战败对东亚国际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等等。本文将就这些问题做一点粗浅的探讨。

二、朝鲜：东亚国际矛盾斗争的集中点

甲午战争的烽火在朝鲜燃起，是由于朝鲜已成为日本向亚洲大陆扩张的第一个目标，成为东亚国际矛盾斗争的集中点。

这种形势根源在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东来及日本对朝鲜的激烈争夺。

19世纪40年代英国打开了中国，50年代美国冲开了日本，西方列强纷纷进入东亚。在这股西力东渐潮流的涌动中，地处中国、日本间被称为“隐士之国”的朝鲜无法再安然锁国了。要求朝鲜开港通商的压力越来越大，一些国家甚至寻找藉口实行武力入侵。1866年法国舰队一度占领江华岛（朝鲜历史上的所谓“丙寅洋扰”），1871年美国军舰攻击江华岛（“辛未洋扰”），都受到朝鲜的抗拒，未能取得任何成果。此时，与朝鲜一水之隔的日本也兴起了一阵“征韩论”的叫嚣。不久之后终于迫使朝鲜开放者正是日本。

1875年日军舰“云扬号”到朝鲜江华岛附近进行测量，与岛上守军发生冲突，水兵登岸肆虐后退出。第二年，日本以武力威胁，迫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日朝修好条规》）。约内规定在20个月内朝鲜向日本开放釜山等三个通商口岸，日本得在各开放口岸派驻领事，享有领事裁判权。这是朝鲜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这个条约之于朝鲜很像《南京条约》之于中国。日本由此向大陆扩张迈出了第一步，以特权者身分进入朝鲜，成为朝鲜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侵略者。

日本从侵入朝鲜的第一天起，其活动就带有强烈的反对中国的性质，这集中体现在《江华条约》第一款上。这一款写道：“朝鲜国

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①这些话就日本来说，完全是虚伪的、欺骗性的，因为它并不真尊重朝鲜的自主和平等，这个由日本强加的、使它在朝享有特权因而破坏朝鲜主权的不平等条约本身就是明证。实际上，这些话乃别有用心，是针对中国、针对当时中国与朝鲜之间的宗藩（宗属）关系的，其真实含义是以此否定朝鲜为清朝的“藩邦”、“属国”，否定清朝在朝鲜的“上国”、宗主国地位，其目的是离间中朝关系，为把朝鲜纳入日本的势力之下扫除障碍。

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由来已久。这种关系的基本形式是入贡与册封；朝鲜以中国为“上邦”、“上国”，中国以朝鲜为“属国”、“藩邦”；中国承担保护朝鲜的义务，而又尊重其独立自主，不干预其内政外交。有清一代，这种关系还存在于中国与周边其他许多邻国以及少数非接壤国之间：这些国家分别与中国发生双边关系，集所有这些双边关系之和，形成一个亚洲东部特有的以中国为中心、由这些国家辐辏而成的国际关系体系。在这个国际关系体内，中国与各国的关系有疏有密，其中与朝鲜、越南、琉球三国关系最密，而朝鲜尤为密中之密。日本把中国基于这种关系而在朝鲜的存在视为它侵夺朝鲜的一大障碍，在其侵入朝鲜之始，就一心要割断中朝间的这种固有关系，对朝条约首先宣称“朝鲜自主之邦”，其奥秘即在于此。可以说，《江华条约》已透露出日本对朝关系中的这样一个消息：把中国排挤出去，以便于将朝鲜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这成为它在朝鲜的战略目标，直到 18 年后发动甲午战争，从未有所改变。

《江华条约》既打开了朝鲜的大门，日本的势力便迅速发展起来。釜山（1876 年）、元山（1880 年）、仁川（1883 年）三地相继开港，

①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三联书店 1979 年，第 135 页。日文约文见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1840——1945》（以下简称《日本外交年表、文书》），上，文书，第 65 页。

日本不但凭藉其货物进口免税的特权，向朝鲜倾销大量商品，而且在这些地方相继设置了日本人特别居留地。这些特别居留地很有点像西方国家在中国一些通商口岸设立的租界，而其侵害主权的程度比租界犹有过之：它们“几乎等于日本领土的延长”，形成“对朝鲜进行殖民地化的根据地网。”^①1880年日本实现公使常驻朝京汉城，这是外国派驻朝鲜的第一个、在当时也是唯一的常驻代表，这表明日本在朝鲜已占有重要的政治地位。第二年6月，日本使朝鲜成立日式军队“别技军”，聘日本军官堀本礼造少尉为军事教官，日本势力又渗入了朝鲜的军队之中。

日本的入侵及其势力的增长引起朝鲜民族越来越大的怨愤，日本商人尤其为朝鲜人民所憎恶，朝鲜社会中的反日情绪日益高涨。日本在朝鲜的种种活动也引起清政府的不安，清政府也苦心筹划在朝鲜抑制日本之策；但它首先想到的并不是自己在朝鲜直接做点什么，而是劝朝鲜把欧美各国引进来，与它们立约通商。1879年8月李鸿章致书朝鲜国王之叔、原任太师李裕元提出此议，美其名为“以敌制敌之策”。他说：“日本之所畏服者西人也。以朝鲜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统与西人通商制日本，则绰乎有余”。“若贵国先与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杜俄人之窥伺，而俄亦必遣使通好矣。”^②这时美国正为谋求打开对朝关系、进入朝鲜而一筹莫展：它的代表薛斐尔(Shufeldt, R. W.)直接叩朝鲜的大门，被拒绝；求日本居间帮助，毫无结果。薛斐尔到天津，李鸿章表示愿意协助与朝订约，使他绝处逢生。另一方面，李又为朝鲜“密择邦交”，选定“先联美国”。^③他告诉朝鲜当局，“美国直接大东洋，向无侵人土地之心，今先与彼立一平善条约，既可杜东邻觊觎，即他

① 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上册，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63—164页。

② 李鸿章致李裕元函，全文见王芸生前引书，第141—144页。

③ 北平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以下简称《中日史料》）卷三，第9页。

国续议通商，亦得有所据依，间执要求之口。”^① 在他的“居间主持”下，1882年5月朝美签订《通商条约》。这个条约不以《江华条约》为依据，但仍然是一个不平等条约（美国在朝鲜享有领事裁判权等特权）。由此美国继日本之后也以特权者的身分进入朝鲜，成为朝鲜的第二个侵略者。

清政府积极促成朝美订约，既是为了保护朝鲜，以美国制衡日本；也是为了维护中朝关系和中国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这个条约实际上是李鸿章手下的人与美国代表谈成的，他们拟定的约稿第一款第一句话就是“朝鲜为中国属邦”，^② 显然与《江华条约》针锋相对。美方不接受，最后的约文删去了此语。为弥补计，由朝鲜国王于条约签字前发一照会给美国总统，里面第一句话仍申明“朝鲜素为中国属邦”^③；但接下来的话都是强调朝鲜自主的，与《江华条约》的精神完全一致。结果是，美国进入朝鲜，不是牵制了日本，而是与日本合流；朝美条约成为继《江华条约》之后分离朝鲜与中国“第二个楔子”。^④

朝美条约签订两个月后，朝鲜首都爆发“壬午兵变”。这本质上是一场大规模的民众反日运动，而又牵连到朝鲜宫廷内部斗争。事发之后，日本决定乘机要挟。清政府得到日本要派水兵步兵各七百余人去朝鲜的报告，立即决定也派水陆两军前往，以保护朝鲜并“护持”日本：保护朝鲜，是中国作为宗主国本应承担的义务，正如一道上谕所说，“朝鲜久隶藩封，论朝廷字小之义，本应派兵前往保护”；而“日本为中国有约之国，既在朝鲜受警，亦应一并护持，庶师出有名，兼可伐其阴谋。”^⑤ 日本的阴谋必应予以挫败，是因为它威

① 王芸生前引书，第198页。

② 王芸生前引书，第194页。

③ 《中日史料》卷三，第13页。

④ Dennett Tyler:《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p. 461.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2.

⑤ 《中日史料》卷三，第32页。

胁到中国的安全，军机处一个奏折中说，“倘日本乘此机会或助国王以灭乱党，或助乱党以废国王，从此大权在握，操纵自如，法人之于越南，其前事也。以日朝而成法越，则中国之患将不独在藩属，而在肘腋，其为祸害何可胜言。……论字小之义，已难坐视；为固圉之计，尤应亟图。”^① 所谓亟图，就是积极干预，这是中国为在朝鲜遏制日本第一次采取直接行动，这样做的原因和根据在上引上谕和军机处奏折中已有清楚的阐释。以此为始，随着日本对朝侵略的不断加深，中国在朝鲜的干预也不断发展。

清政府出兵三千到朝鲜，牵制了日军，使其未敢妄动；但中国入朝军并没有与日本发生接触，也避免直接介入朝日谈判。^② 8月30日，日朝缔结《济物浦条约》，朝鲜同意向日本道歉、赔款，同意日本派兵护卫公使馆。这是日本第一次在朝鲜京城、也是在亚洲大陆取得驻兵权，这表明它的势力仍在发展。

1882年10月1日，中朝两国订立《商民水陆贸易章程》。要求变更两国边界互市旧制、使两国人民在已开通商口岸得以互相交易，这是朝鲜国王的倡议；订立此贸易章程，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章程前言开宗明义，“朝鲜久列藩封，典礼所关，一切均有定制，毋庸更议”，现改变贸易旧例，“系中国优待属邦之意，不在各与国一体均沾之列”。^③ 按照章程的有关规定，等于中国单方面在朝享有领事裁判权。章程最后一段载明是清政府代表“会同”朝鲜代表“议定”的，但很明显是前者加给后者的。这实际上是清政府第一次以近代条约的形式来规范中朝关系，宗藩关系仍被定为相互关系的基础和前提，所以李鸿章称这个章程是“维藩服而扩利权”的。^④

① 《中日史料》卷三，第33页。

② 马建忠劝朝鲜对日妥协。《中日史料》卷三，第46—47页。

③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第404—405页。

④ 《中日史料》卷四，第20—22页。

第二年，清政府根据这个章程向朝鲜首都派驻总办商务委员^①，是为中国有代表常驻朝鲜之始。中国在朝鲜的势力和影响大为加强。

各国在朝鲜的矛盾斗争、特别是中日间的矛盾斗争与朝鲜内部各种政治势力间的矛盾冲突交织纠结，越来越激化。1884年12月朝鲜开化党发动政变（甲申政变），谋杀大臣，劫持国王，一时控制了政府，宣布断绝与清朝的宗藩关系。政变者想依靠日本以实现其改变朝鲜政治的愿望，日本则藉此以扩充在朝势力，其驻朝鲜公使及驻汉城的军队都直接介入了此次政变，日军一部分且闯进王宫，支持政变政权。驻朝华军随即开来，驱走日军，恢复了朝鲜原来的统治。中日两国军队在朝鲜首都、在王宫内直接对峙、冲突，反映了斗争的极度尖锐，其结局则表明中国军事力量在朝鲜比日本占有明显优势。

为解决甲申政变中中日两国在朝“争斗”造成的问题，1885年4月伊藤博文到天津与李鸿章举行谈判。这是两国第一次直接专门谈判朝鲜问题，这本身已表明在处理有关朝鲜的问题上日本取得了与中国对等的地位。谈判结果定约三条：一、中国驻扎朝鲜之兵及日本在朝护卫使馆之兵，四个月内都“各行尽数撤回”；二、嗣后朝鲜军事教练“由朝鲜国王选雇他外国武弁”担任，中日两国均不派员到朝鲜任教练；三、“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② 这使两国在朝鲜一时免于军事接触，而“将来”又同有军事干预权。这等于以条约确立了两国在朝鲜军事对等，从而提高了日本在朝鲜的地位。

这时由于更多的国家陆续进入，朝鲜的局势进一步复杂起来。

继美国与朝鲜立约之后，英、德（1883年11月）、意大利（1884

^① 李鸿章说，“朝鲜为中国藩服，委员前往驻扎，与出使外洋各因体制稍别，而情事略同。”《中日史料》卷五，第9页。

^② 王铁崖编前引书，第465页。

年 6 月)、俄国(7 月)、法国(1886 年 6 月)也分别与朝鲜签订条约，建立邦交。所有这些条约都带有不平等性，这就意味着短短几年间，朝鲜身缚着不平等条约网，向世界主要列强开放了。来到的国家增多，而又各有所图，利害不一；再加上自穆麟德(Mollendorff, P. G. von)以来任职于朝鲜各机构中的一些洋员谗言播弄，于是造成旧矛盾蔓延辗转，^①又产生一系列新矛盾，其中英俄矛盾一时成为朝鲜国际斗争的中心。

1885 年 4 月英国舰队侵占朝鲜巨文岛。这完全是对着俄国的：当时英俄正为阿富汗北部边境问题闹得剑拔弩张，英国为扼制海参崴俄国的海军力量，擅自强占了朝鲜南海中的这个岛屿，建立起军事据点，这就把两国间的矛盾从中亚扩大到了东亚，朝鲜成了两国的角逐场。事发之后，英国首先希望得到清政府的支持。初时清政府表示不予反对。但俄国发出威胁，宣称如中国政府承认英国对巨文岛的占领，则它认为就有占领其他岛屿或朝鲜王国一部之必要。日本也有此种危险。清政府不安起来，便转而要求英国军队撤走。英国提出，如果能保证不使任何他国占领该岛，它可以撤兵。清政府与俄交涉，得其保证：如英国退出该岛，它决不夺取朝鲜土地。清政府据此向英国做出保证后，英军于 1887 年 2 月撤出巨文岛。在这场有关朝鲜领土安危的斗争中，清政府俨然成为各方面折冲交涉的中心，它自居于能为朝鲜做主，有关各方也以此相期，这表明中国在朝鲜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也等于这些有关国家承认中国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承认中朝间的宗藩关系。

将近两年的巨文岛危机表明，俄国正在成为朝鲜国际斗争中的重要因素。在此期间，朝鲜表现了明显的亲俄倾向，俄国则想充当朝鲜的保护者，这使本已担心俄国向朝鲜扩张的中日两国益增

^① 关于中国在朝宗主权问题的分歧是中日两国在朝矛盾冲突的根源，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与日本站在一边，英国则以各种方式支持中国。“然而美国的政策业已给予日本的帮助，就像一个同盟国一样。英国在朝鲜为中国的利益所做的，其成就永远也不能像美国为日本做出的那么多。”Dennett 前引书，第 482 页。

疑虑。日本恐惧尤深，它明白，对于它争夺朝鲜来说，俄国作为竞争者其危险性远远超过中国之为障碍，因此防俄应急于和重于反华，为防俄甚至有必要联华。于是它调整政策，采取了对华新策略：缓和对华关系，怂恿清政府加强对朝鲜的控制，借以遏阻俄国^①。这反映了日俄矛盾的加剧。

自日本势力侵入朝鲜，在朝鲜触发了国际间利害关系的冲撞以来，经过十余年，朝鲜已成为东亚国际矛盾斗争的集中点。各种矛盾越积越多，各种形式的斗争也越来越复杂，其中任何一种如果激化起来，都可能酿成武力冲突，因此，战争的危险已潜伏于朝鲜。多种矛盾错综纠结，而根源最深、时间最久、对抗性最强且已屡有剧烈表现的乃是中日矛盾。80年代后期，由于日本政策策略的某些改变，中日在朝关系表面上有所缓和，但深层的矛盾不但没有消减，反而在继续发展。清政府以袁世凯为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以空前的声势多方面干预朝鲜内政外交，大力强化在朝宗主权，与日本必欲割断中朝宗藩关系的既定战略目标根本对立。日本则不但继续在朝鲜发展势力，而且加紧为夺取朝鲜制造理论，1890年内阁总理山县有朋提出朝鲜为日本“利益线的焦点”要加以“保卫”，必须以“强力”排除别国的侵入^②，等等，就是一个明确的动向。更重要的是，自壬午兵变、甲申政变中日本在朝鲜两次受挫以来，日本统治者已意识到，要夺取朝鲜，在大陆上扩张，迟早必须同中国进行一场决战；从那时起，日本就已针对中国有计划地大力开展了扩军备战，多年来始终如一，毫无松懈。到1894年，此一战备已趋于完成，由于对内对外政治的需要，便蓄意制造了这场战争。

① 日本的新策略集中体现于榎本武扬奉外务卿井上馨之命向李鸿章提出的“朝鲜外务办法”八条中。见《中日史料》卷八，第25—26页。参阅第21—22、24—25页。日本的打算显然是以清政府在前台、日本居幕后，两国共同保护朝鲜，以防止俄国的侵入。

② 信夫清三郎前引书，第236—237页。

三、日本：“脱亚入欧”

1885年3月，法国侵华战争正在进行，福泽谕吉为日本提出了一个向中朝两国侵略扩张的理论：“脱亚入欧（西洋）”。他在自己主办的《时事新报》上以《脱亚论》为题，发表评论说：西洋文明之风东渐，日本国民已渐知采纳此近世之文明。不幸其近邻有两国曰支那、曰朝鲜者，在方今文明东渐之风潮中，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维持其独立，今后不出数年其国将亡，其领土将为世界文明诸国所分割。故“为今之计，我国不可再犹豫踌躇、坐待邻国之文明开化而与之共同振兴亚洲，毋宁应脱离其行列，去与西洋文明诸国共进退。我国对待支那、朝鲜之法，无须因其为邻国而有所顾忌，只能按照西洋人对待彼等之方式方法加以处理”。^① 事隔九年，日本以西方列强对待东亚之道对待朝鲜、中国，可以说是这个脱亚论的一次典型实践。

1894年朝鲜南部全罗道爆发东学党起义，来势迅猛。朝鲜政府震惊，急切向中国求援。^② 日本期待并怂恿清政府出兵。6月初，清政府根据“保护属邦”旧例派军赴朝，并以此知照日本。日本立即说朝鲜发生“变乱重大事件”，援引1885年4月中日天津条约，也向朝鲜派兵。^③ 以此为始，它的侵朝阴谋便一步步展开。

中国军队的集结地是牙山，面对东学党活动区，一心只为帮助朝鲜政府解除起义军的威胁。日军则分驻仁川、汉城，“早晚不断往

① 《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岩波书店昭和35年，第238—240页。

② 朝鲜政府递袁世凯请援书中说，“壬午、甲申敝邦两次内乱，咸赖中朝兵士代为戡定，兹拟援案烦贵总理迅即电悉北洋大臣，酌遣数队，速来代剿”。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三联书店1980年，第27页。

③ 6月7日本公使照会总理衙门所说出兵朝鲜理由，显然是以1885年4月中日天津条约为依据。见王芸生前引书第二卷，第29页。6月12日日使致总理衙门照会改变说法：“我政府并未认朝鲜为清国属邦。此次我国派兵朝鲜，是凭济物浦条约而于为之，遵照天津条约办理在案。”同书，第29—30页。

来于”其间^①，显然别有用心。此时日本还在参谋本部内设立了大本营，组建战争体制。

东学党起义军与政府讲和，朝鲜局势迅速平静了下来。按照中日天津条约，两国军队应即撤回。清政府提出这样的建议，朝鲜也提出这样的要求，日本却决定不撤兵，反而继续向朝鲜增兵。这就造成了对朝鲜武力威胁的态势，并毒化了中日关系。

为了给留兵驻朝找藉口，日本制造了一个改革朝鲜内政的题目。它要求清政府与它一起促朝鲜改革内政，被清政府拒绝。^②于是它便单独迫朝鲜改革。6月26日日使面谒朝鲜国王提出此一要求，7月4日更具体提出何者当革、何者当兴的纲领条目，要朝鲜政府一一照办。这就走上了公然干预朝鲜内政的道路。

日本对朝鲜逼压，其着眼处不止是一个朝鲜，而且还有中国，那是走向对中国动武的一个步骤。7月19日，日本向朝鲜提出四项强硬要求：一、汉城、釜山间架设军用电线，应由日本政府自行负责进行；二、朝鲜政府应遵照济物浦条约速为日本军队修建必要之兵营；三、驻牙山之中国军队，应速使其撤退；四、应废除中朝贸易章程及其他与朝鲜独立相抵触之一切中朝条约。^③第二天日使又以最后通牒要朝鲜“亟令清军退出境外”，限22日以前“确复”。^④由此将威逼朝鲜与对付中国直接联系了起来。最后通牒期满后，事态急转直下。

① 陆奥宗光著：《蹇蹇录》，伊舍石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8—20页。

② 6月21日中国驻日公使照覆日本政府：“善后办法（按：指改革朝鲜内政）用意虽美，止可由朝鲜自行厘革。中国尚不干预其内政，日本素认朝鲜自主，尤无干预其内政之权。”（王芸生前引书第二卷，第37页）义正辞严地驳斥了日本的无理要求，并一针见血地戳破了它多年来不断侈谈朝鲜“自主”的虚伪性。

③ 陆奥宗光前引书，第35页。作者谈到提出此四项要求的背景时写道，他已感到需要“促成中日间的冲突”了，于是7月12日电令驻朝公使大鸟圭介“采取断然处置”，“只要在不招致外间过分非难的范围内，不妨利用任何借口，应即开始实际行动。”大鸟也已感到“有采取高压政策的必要”，于是有7月19日的四项要求。同书，第34页。

④ 王芸生前引书第二卷，第68—69页。

7月23日，日调大军侵入汉城，直逼王宫，“攻开城门，进入宫内”，^①劫持国王，制造政变，扶植大院君组织傀儡政权。从此日本实际上控制了朝鲜政府，朝鲜的重要政令无非都是日本意志的体现了。

25日，大院君政权矫诏宣布“朝鲜为自主之国，不再朝贡”，并请日军驱逐驻牙山的清军。^②同日日舰在丰岛海面向中国开战。从此日朝两国政府之于中国就立于“攻守相助之地”了。^③

日本出兵朝鲜不到两个月，就把这个国家攫入了自己的掌握；而攫夺朝鲜又成为走向对华开战的过渡：夺取朝鲜完成之日，也就成了对华战争开始之时。两者的联系如此之密，可知此时日本侵朝侵华实为一事。

对华战端既开，8月20日日本把一个《暂定合同条款》加给了朝鲜，使日本干涉朝鲜内政合法化并成为它的一项条约权利，还使它获得一些实际利权。8月26日日本与朝鲜签订《盟约》，明确规定首要目的是“撤退清兵于朝鲜国境外”，“日本承担对清国攻防战争之责，朝鲜对日军之进退及其粮食供应，应给予最大便利”。^④关于为什么要订立这个同盟条约，陆奥宗光半虚伪半坦率地指出：“为了防止将来发生种种阻碍，就需要用一个国际条约来加以规定，一面表明朝鲜是一个独立国，具有可以同任何国家订立攻守同盟条约的权利；同时，在另一面将其确切地掌握在我国手中，使其就范，不敢他顾，因而才采取订立条约这个一举两得的策略”。^⑤把朝鲜签订一个使自己归日本掌握、日本能“使其就范，不敢他顾”的条约说成表明朝鲜是一个有同他国签约权的“独立国”，这是陆奥

① 陆奥宗光前引书，第35页。

② 王芸生前引书第二卷，第70—71页。

③ 8月26日日朝《两国盟约》前言语。《盟约》日本文见《日本外交年表、文书》，上，文书，第157页。

④ 陆奥宗光前引书，第77页。

⑤ 陆奥宗光前引书，第77页。

之流日本人独特的逻辑，照此逻辑，16年后朝鲜签订“合并”于日本的亡国条约也是表明它的“独立”了。日朝《盟约》真正表明的，不过是朝鲜沦入了日本对华战争附庸的境地，处于日本的“保护”之下了。

这个盟约签订不久，经过平壤之战，中国军队全部退出了朝鲜。接着，日军渡江过海分路向中国逼近，战争从朝鲜扩大到中国境内。战区先在辽东半岛，次年延及山东半岛。自鸦片战争以来，欧洲列强曾先后发动过多次侵华战争，侵略军曾攻入广东、福建、台湾、浙江、江苏、直隶（河北）各省的许多地点，中国沿海只有山东、盛京（辽宁）两省的陆地还不曾有过外军的踪迹；而此次日军铁蹄所踏正是这两省，它几乎侵占了整个辽东半岛，其深入于中国领土之宽广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对华军事侵略。

日本把战火从朝鲜推入中国，表明它发动战争所追求的不仅是要得到朝鲜，而且要有所得于中国。至于要在中国所为何事，它并没有宣布过。^①但徵诸前史后事，事情可谓一明如镜：一言以蔽之，它要取得西方列强在中国的一切利权并夺取中国领土。

近代中日关系是从1871年两国签订《修好条规》开始的，日本谈判此约之初，就想“一体均沾”欧美各国在华已有的各种特权，被清政府顶了回去，未能如愿。以后它一得机会就重提此议，又总不能成功。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在中国眼巴巴地看着欧美各国拥有种种特权、利益，自己却不能同享，是极不甘心的；屡次用和平手段争而不得，就要用武力来夺取。于是在朝鲜已入其掌握后，大军便压入中国。而战争果然遂了它的夙愿，《马关条约》第6款规定：中日两国所有约章，因此次失和，自属废绝。中国约：俟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速派全权大臣与日本所派全权大臣会同订立通商行

^① 明治天皇对清国宣战诏书一开头要“百僚有司，宜体朕意，海陆对清交战，努力以达国家之目的”。以下满篇文字都是就朝鲜各事肆意攻击中国，而不及其他，似乎其“国家之目的”仅在朝鲜。

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其两国新订约章，应以中国与泰西各国现行约章为本。又本约批准互换之日起，新订约章未经实行之前，所有日本政府官吏、臣民及商业工艺、行船船只、陆路通商等，与中国最为优待之国，礼遇护视，一律无异。^①

这样一来，西方列强在中国已有的一切，日本也都有了。

甲午一战，日本囊括了朝鲜，打败了中国，在中国取得与欧美各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在朝鲜且超过之。它与邻国划开了一条鸿沟，脱离了正被加深侵略的“亚洲”的行列，跻身于欺压、奴役别国的“欧洲”的队伍（它首先欺压的是朝鲜、中国），由此完成了“脱亚入欧”。它成了与中国、朝鲜截然对立的东亚地区内唯一与欧美列强同一类型的侵略国家，走上了在东亚称霸的道路。^②

四、中国：“东洋之波兰”

日本在战争中的胜利由《马关条约》固定了下来，条约第一款写道：“中国认明朝鲜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③这个所谓朝鲜“独立自主”与日朝《江华条约》中的“自主”含义一样，是对中国而言的，是否定中朝宗藩关系的。不过那时清政府没有承认，条约文字也没有明说，而现在在清政府自己被迫签字的条约上明确无误地写出来了。至于这个“独立自主”对日本是什么含义，只要看看前述它在朝鲜的所做所为就可一清二楚。这就是说，经过甲午战争，终于实现了日本割断中朝关系、把中国赶出朝鲜的夙愿。不过，它并没有保住战时在朝鲜取得的绝对优势，因为三国干涉还辽以后，俄国登上朝鲜这个国际政治舞台，与日本展开争夺，日本

① 王铁崖前引书，第 615—616 页。

② 早在朝鲜甲申政变后，福泽谕吉就发表文章主张诉诸武力，并预想如果在对清战争中获胜，日本“将永被尊为东方之盟主”。信夫清三郎前引书，第 203 页。

③ 王铁崖前引书，第 614 页。

不得不有所后退。战后几年间,朝鲜(1897年10月改名大韩帝国)成为日俄两国的角逐场,但不再是东亚国际矛盾斗争的集中点了。

中朝关系被割断,具有重要意义。原来在那种关系下,中国在朝鲜占有重要地位,因而在朝鲜的国际斗争中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东亚国际政治中能发挥重要作用:那是中国在已遭受欧美列强侵凌下仍不失为东亚大国的一个主要标志和象征。此外,自中国与琉球、中国与越南的宗藩关系被日、法割断后,中朝关系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关系体系的最后一个环节;如今这个环节也破坏了,那个国际关系体系随之最终解体。中国的东亚大国地位为日本所取代,从此沦入了一个单纯被侵略国的可悲境地。

《马关条约》还规定中国割地、赔款、给日本种种利权,这对中国是一次惨重的剥夺和宰割。

甲午战争的结局和《马关条约》的缔结造成多方面的后果,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引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争夺。

争夺的发端是对华借款权。日本要索二万万两白银赔款,清政府只能靠向外国借贷来支付,于是有多国竞揽这笔大生意。经过激烈争夺,三次大借款法俄集团得到其一,英德集团获其二。

再一个是争夺路矿、特别是铁路权,列强间展开了一场历史上有名的“争夺让与权之战”。英、俄、德、法、比、美各国都参加了这场没有枪炮的战斗,结果或多或少各有所获。

更严重的是争夺领土,由此造成中国被瓜分的危机。关于这方面的事,日本人早有过计议,前面说到的那位福泽谕吉在甲午战争前十年(1884年10月)就给中国起了个名号“东洋之波兰”,并以此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做出预测,大意是:此次中法战争将成为支那灭亡之前奏。支那之敌不单是一个法国,必将有第二、第三、第四个法国接踵而来,支那之敌将是欧洲的几个强国。这些国家将以18世纪末俄、普、奥三国瓜分波兰的办法处置支那,东洋这个老大帝国将像当年的波兰那样被西方列强所瓜分。文章揭载了“一位住在国外的友人”以《支那帝国未来记》为题致作者的一封信,信中还

戏拟了一件假托法国总理兼外长于 1899 年 12 月致欧洲列强及日本的题名为《支那帝国分割案》的照会，照会就瓜分支那提出具体方案（还配了一幅《支那帝国分割之图》）：广东、广西、云南、湖南、福建五省归法，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江西归英，山东、河南归德，山西、陕西归俄，台湾及福建的一半归日，直隶归各国共有。照会表示希望明春桃李花烂漫时，各国全权使节各携带其政府之特别命令，集会于扬子江畔的南京城，讨论本方案并做出决定。^①

这里设想的是 19 世纪最后一个月提出瓜分中国的方案，20 世纪第一年春由五国会议讨论决定；而事实是由于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并战胜了中国，瓜分的时间提前了。这里设想的是瓜分中国之议始倡于法国，历来人们多认为瓜分的第一刀始于德国强占胶州湾；而事实是开瓜分之端者乃日本割占台湾。这里设想的是列强通过会议协商而实现对中国的瓜分；而事实是列强进行了一场大争夺。总起来说，这里设想的对中国的瓜分起主导作用的是欧洲列强，日本只是一个小伙伴，只能得到台湾全岛及福建的一半，那份假托的照会中说“闽浙沿海之地原是明代末叶日本兵曾经侵入之地，此次能在旧地重扬起太阳旗，日本人当可满足。”而事实是日本占有地（台湾）的面积远远超过德、俄、英、法的租借地，作为变相的领土瓜分的势力范围，日本之所得虽不及他国，却是福建全省：日本在使中国成为“东洋之波兰”中所起的作用比这里设想的大得多，这反映了十年间日本在东亚的侵略地位已大为提高。

因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而促成的帝国主义在华大争夺，参与国众多，涉及面宽广，激烈性突出，这表明这时中国成了东亚国际矛盾斗争的集中点。中国遭遇到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东洋之波兰”的命运如千钧之系于一发。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① 前引《福泽谕吉全集》第 10 卷，第 72—80 页。